

【经济理论与实践】

资源型地区节能减排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晓东

摘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稳增长,二是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在通过推进节能减排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工作中,有关部门并没有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现实与不平衡性,还存在着节能减排指标分配“一刀切”、缺乏长效机制等问题,这就意味着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受到严格的政策制约,也就很难改变“守着聚宝盆挨饿”的现状。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资源型地区在清洁能源输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妥善处理资源型地区节能减排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使节能减排指标分配与各地区发展阶段相匹配、与国家产业政策相协调,同时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快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国家能源统一市场,推动资源型地区在解决转型升级中的共性问题,加快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节能减排约束;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5-0025-06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增长分化较为突出,这促使我们冷静思考下一轮经济实现健康发展、采取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事实上,我国节能减排压力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得到缓解,自“十二五”以来,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尤其是资源型地区都面临非常严峻的节能减排压力。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的深入推进,实体经济不断分化重整,企业活力也逐步恢复,各级政府又将再次面临节能减排的压力。在这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约束的限制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协调发展,将再次考验各级政府的定力与智慧。

一、节能减排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内在要求相吻合

在人类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谓的节能减

排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量。由于目前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市场化的水平,人类不仅担心化石能源的稀缺性,还要考虑消耗这些化石能源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是人类社会未来走向,而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地解决“三废”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则是更为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陈晓东、金碚,2016)。

节能减排意味着在减少投入以及较少的负面产出下实现有效率、绿色环保甚至是创新的市场供给。这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高度一致。从需求侧来看,市场即使顺畅运行,也仍然可能存在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等现象。因此,以需求管理为基本内容的调控时间是短期的,以减少或熨平经济波动周期为主。从供给侧观察,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存在结构性障碍,从而导致调节

收稿日期:2017-04-10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工业化新阶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KGJCX2017-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竞争政策理论前沿与政策走向研究”(SKGJCX2017)。

作者简介:陈晓东,男,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 100836)。

机制系统性失效。因此,从供给侧发力的对策措施主要是对实体经济层面进行调整,着眼于长期效果;调控和干预主要围绕化解过剩产能,消化库存,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个急迫的目标,即在稳增长的同时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稳增长的实质是要激活实体经济内生的新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再次采取刺激性措施来扩张规模。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就是要逐步摆脱资源和投资这种双轮驱动模式,实现创新驱动,使产业结构现代化、绿色化、高效化,使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金碚,2016)。

资源型地区在上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周期中,其发展多表现为大量的要素投入和废弃物的排放,虽然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能源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等现象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能源、资源为支柱的产业发展也遇到了诸多瓶颈。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品附加值比较低、产业链短、能耗高、污染大等问题凸显,虽然通过能源与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得了短暂的繁荣,却付出了生态环境被破坏到难以恢复的代价。

面对实体经济逐步向好未来严峻的节能减排压力与任务,资源型地区在理顺节能减排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的同时,要直面节能减排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找到在节能减排约束下适合本地区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着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共赢,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因地制宜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结合

经过这么多年的快速工业化,我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产业配套、技术成果转化和抗风险能力。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会加快,能源资源的消耗量还将有所提高,温室气体和废弃物排放也还会增加。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既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又要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和发展低碳经济,自然会面临一些矛盾与挑战,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无限扩张与生态环境容量有限的矛盾、发展方式转变的渐进性与污染能耗问题解决的长期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性等仍会比较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受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各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人均 GDP、工业化率、产业结构、就业水平等方面。而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行统一的节能减排标准,这显然有失公平。如果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分类指导和区别对待,给予欠发达地区相关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些地区在实现经济社会总体目标时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客观上也会减少一些行业或部分地区采用低效率、高成本的措施来应付节能减排工作,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产业转型升级长效激励机制。

节能减排既是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也是目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一些资源型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近年来肩负着能源供给和大幅节能减排的双重任务。随着全国能源需求量的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作为能源资源供给基地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叠加区域,生态压力环境保护责任日益凸显。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还比较落后,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而目前的节能减排指标分配还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也没有很好区分能源消费过程中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消费比例,特别是能源消费地区和供给地区之间的节能减排指标分配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合理之处;而且现在国家煤化工行业能耗统计标准也出现了重复计算的情况,除煤制油项目将原料煤扣除外,煤制烯烃、煤制甲醇等煤化工企业的原料煤消耗均纳入能源消耗统计范围(孟凡君,2015)。而这部分消耗实质上是物理形态转化,并没有增加能源消耗,应当从能源消耗总量中扣减。

以上情况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资源型地区节能减排工作的效果,也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纽带来设计和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尽量减少政策制度对经济带来的扭曲;而且出台的政策要真正解决我国自身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障碍,要让政策资源的效率发挥到最佳状态。在这个背景下,结合我国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判断各项节能减排技术在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技术发展特点出台相关政策,激活创新驱动动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陈晓东、金碚,2016)。

三、依靠技术创新与促进充分就业相协调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取得的传统工业化的成就主要采取的是低成本替代策略,以模仿创新的方式快速向各产业领域推进的结果。而目前产能过剩和市场饱和促使我国必须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努力拓展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努力攀登新技术的制高点。这是产业技术变迁的巨大跨越,不仅需要实现累积性技术进步,更要实现开拓性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品供给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有效实现节能减排最重要的方式。理论上讲,如果技术足够先进,现在所谓的那些废物也是资源,换句话说,世界上就没有废弃物。在煤化工领域,随着化工科技的进步,现在许多废料都已经可以完全利用,变废为宝,进一步延伸到印染业、医药制造业等相关行业。当今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同样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与技术创新,这也是我国实现节能减排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技术效率改进与技术创新均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技术效率的改进对工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不仅要发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促进作用,还要进一步提高技术效率改进对工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节能减排在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上还有很大空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的能源生产供给与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相对还比较落后,技术开发能力和关键设备的制造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资源型地区的主要行业多集中在资源型产业,通过减少资源使用量的方式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近年来这些地区很多企业在发展与升级换代时都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甚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但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在不景气、订单来源减少的时候,这些最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的使用与设备运行的成本成

了企业最大的心病。运行,其收入不足以弥补成本;不运行,违法排放,处罚则更为严厉。如今只有少数一些采用国际最先进技术与设备的重化工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在市场景气的时候有非常可观的利润,目前也还能微利或者保本运行,其他的企业干脆关门歇业,员工长期处于放假状态,虽然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但企业已经不发放工资,需要自谋出路;再加上一些因为采用最先进技术设备而被替代下来的员工,这种显性失业和隐形失业叠加在一起,很容易影响这些欠发达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失去工作机会和岗位的产业工人,妥善解决他们分流培训再就业的问题;同时,针对新兴产业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提出的新要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在适当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条件下,企业完全有能力也有动力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减排,甚至由此盈利的也屡见不鲜。因此,应该特别重视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来实现节能减排,尤其是鼓励那些已经采用较为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对于那些遇到技术天花板的行业如电解铝,一方面需要对此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需要积极着力于提高现有的技术效率,实现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同时,还可以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与措施,积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 and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长期投资与节能减排目标相一致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需要科学认识供给侧与需求侧及其对应政策。现实经济生活中,同一类经济行为往往都具有供需的双重含义。任何经济学概念都不可能精确地对应客观现实,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并无绝对的界限。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一般被认为是需求。对短期来说投资是需求,表现为拿钱去买生产要素;而对长期来说,投资则是供给,它决定了生产能力和技术状况。其实,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对应政策,都得运用投资手段,只不过是前者主要应对短期的经济波动,后者主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长期目标。

从长期来看,现有的和前瞻性技术的开发、部署与应用,对于我国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将起到关键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长期节能减排

及其相应的科技发展目标,其研究几乎都是基于技术能够顺利研发并最终实现商业化应用的假设。由于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仍然存在延迟甚至失败的风险。

各项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需要巨额的成本与投资。如果是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C 以内,到 2030 年,全球每年的节能减排的成本至少为 2000 亿—3500 亿欧元,而且每年还需要 1 万亿美元的投资来保证关键技术的研发及其商业化,这相当于全球 40% 的基础设施投入或者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1.4%。根据麦肯锡估算,如果油价保持 60 美元/桶不变,到 2020 年,每年需要的增量投资约为 530.0 亿欧元,到 2030 年则达到每年 8100 亿欧元(陈晓东、金碚,2016)。

节能减排所需要的投资水平与所选技术的成本直接关联,并随着节能减排的深入,所需投资水平将不断增加,巨额的投资将为中国实现能源强度降低的目标带来更严峻的挑战。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持续深入,国家需要考虑依据节能减排成本来制定阶段性能源强度和减排目标,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技术成本的降低。

要综合考虑各种节能减排技术所需的前期投资与应用成本。各领域技术的节能减排成本与前期投资之间并无必然关联,二者对技术应用也都会产生影响。巨额的前期投资和成本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我国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机遇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中国市场的规模及其将来的发展,使得节能减排技术在规模化应用时成本较为便宜;在中国建立新企业的时间与成本,远远比发达国家同类企业更新换代相关机器设备的成本低很多;在合理政策的引导下,投向低碳技术的资金尤其是民营资本会很快集聚。

五、节能减排要与国家产业政策相匹配

产业政策指政府通过改变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从而实现对经济活动施加的宏观上的干预。产业政策一般分为横向政策和纵向政策两类。横向政策一般跨行业,用来帮助众多行业应对共同的市场失灵。横向政策并不具有选择性,并不针对特定的行业或企业。而纵向政策是针对特定行业或企业应对所谓的市场失灵的。一般认为,由于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中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产业政策是不

可或缺的。但是,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撇开去年热烈的“林张之争”不说,早在 1997 年,就有产业政策在东亚奇迹中究竟是否有用的争论话题。当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主管尤素福主编的《东亚奇迹的反思》一书中强烈怀疑产业政策的有用性(Yusuf,2001),而斯蒂格利茨在总结性一章中,却对这些技术性研究成果大加质疑(Stiglitz,2001)。

为了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和促进西部资源型地区产业发展,我国曾出台《关于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资源加工型产业优先向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转移。我国是一个煤多油少气少的国家,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而且这种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新能源技术及其广泛应用。节能减排的本质是要提高资源能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使用效率并逐步实现投入数量的减少,而不是像很多地方被动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来对付完成。前些年市场景气的时候,许多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硬任务难以完成,各地发展的冲动实在难以抑制,一些地区只好无奈地采取“拉闸限电”等强制性措施。这种采取突击性手段来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虽然一时数字达标,但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当经济不景气了,许多企业开始关门歇业,员工也处于放假休息状态了,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任务不用采取强制措施也能轻松完成(陈晓东、金碚,2016)。其实,这是没有摆脱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如此循环往复,经济转型升级恐怕难以顺利实现。正因为如此,节能减排才成了地方政府业绩考核的关键一票。

但是目前的节能减排任务却与先前国家公布的鼓励西部资源型地区发展资源加工型产业相矛盾。一方面,没有参考相关资源型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等不同因素,节能减排指标分配给西部地区的总量不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欠发达资源型地区的节能减排基数相对较小,如果按相同比例下调指标数,留给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节能减排空间将更加狭窄,这就意味着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受到严格的政策制约,很容易造成西部资源型地区已有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的流失,也就很难改变“守着聚宝盆挨饿”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行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差异性,指

标分配与各地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定位相脱节。我国能源资源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而能源资源消费却集中在东部地区,能源资源赋存与能源资源消费逆向分布与流动,客观上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运力紧张、企业成本负担加重等问题的出现。因此,节能减排指标分配方法,不仅要考虑西部资源型地区欠发达的社会现实,还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地区重化工的产业结构特征,要给予其适当的政策倾斜,才能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加工型产业良性发展,才能保证东部发达地区清洁能源的供给,才能推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六、节能减排的长效深入需要有政策激励

西部资源型地区为了维护全国的生态环境安全,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另一方面还服从服务于发展大局,不断地向东部发达地区提供清洁能源。因此,国家需要对这些地区给予相关的政策优惠与扶持作为补偿(课题组,2016)。

完善对西部资源型地区财政支付政策,增加对这些地区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同时建立用于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将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低碳产业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结合起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调整农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这些地区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推进低碳产品标记,通过对西部地区的以低碳方式生产的产品加以标记,肯定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而且通过扩大这种商品的销量,鼓励西部发展低碳产业,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促进这些地区特色绿色产业的发展。

加大对西部资源型地区的环保投入。中央政府在统筹全国环保建设的同时,尽力引导资金倾向西部资源型地区,运用多种手段,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减免税收等方式,加大对这些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的补偿力度。继续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提高节能环保产业引导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财政补助、贴息、资本金注入等多种形式扶持基地公共服务体系和重大产业化项目建设,保证国家专项资金的配套落实。

建立西部资源型地区综合性生态补偿机制。尽管西部资源型地区当前的低碳环境承载力水平较强,但由于这些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这种优势随

时都会丧失。因此,根据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因素,综合运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调整相关利益方关系,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西部资源型地区低碳资源保护的税费政策,对开发利用生态资源的经济活动与行为,征收相应的税费或补偿费用,逐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矿产、沙漠、森林、草原、滩涂、湿地等纳入其中调整税额,把因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成本纳入进来。

七、推进能源统一市场建设以解决共性问题

西部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面临一系列特殊问题,要解决这些地区的特殊问题,一方面主要靠本地区加快自身发展,依托资源优势,由资源大省转变为经济强省,将资源红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民生投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投资等;另一方面又必须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战略支持,实现中央与地方机制体制的协调创新。

以西部相关资源型地区为主,设立国家能源保障经济区。从根本上来讲,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面临的特殊问题,就是在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和东部发达地区清洁能源供给的情况下,更加注重这些欠发达地区自身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能源保障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因此,建议以西部主要资源型地区为主,设立国家能源保障经济区,这一思路可以有效协调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有序开发供给的关系,解决当前能源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一系列利益冲突、生态矛盾和环境保护等关键问题。2010年12月,国家批准在山西省设立国家级资源型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其主要任务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步伐,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这种政策是对西部资源型地区总体发展迈出的第一步支持。山西省是能源开发的老牌基地,内蒙古和陕西是两个新兴的能源大省,特别是内蒙古近几年煤炭产量已经超过了山西省。内蒙古和陕西两省区的资源型产业发展也必将经历山西省发展中存在的诸多困惑和问题,但国家很难在这两个省区也设置类似资源型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因此,从长

远来看,应以这些能源重化工产业为主要产业的资源型地区为基础,设立国家能源保障经济区,统筹兼顾西部这几个能源大省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问题。

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需要与国家整体战略规划及国家能源战略规划相协调。实施统一的能源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发展趋势,而我国历次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适应能源行业发展形势,解决能源行业之间的矛盾,这已经难以适应国家层面的大能源战略管理。因此,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规划,进行顶层设计,对我国能源资源实行统一的宏观管理,制定国家层面的能源发展战略,制定统一的能源政策法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以能源战略管理为核心的能源监管体系,推进国家能源统一市场的建设(课题组,2016)。

在国家能源一盘棋的规划下,重新构建新型的能源资源管理体制。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关于能源资源的管理权限;在坚持政府引导下,提高能源资源产业的集中度;兼顾相关地区的经济社会利益,理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间的资源利益分配机制,也就是理顺国家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构建新型的能源资源管理体制,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早日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upgrading and the Socie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Based Resource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hen Xiaodong

Abstract: China's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has two objectives, one is steady growth, and the other is to achie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mot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China is not fully consider the rea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balance, there is a "one size fits all", the lack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This means that the western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ll be subject to strict policy constraints,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guarding cornucopia hungry". At present, in promoting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cess, we should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Western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the output of clean energy in Chin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resource type provincial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make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distribution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age matched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while increasing fiscal and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energy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promote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sol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mmon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 the constraint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region based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supply side

参考文献

- [1] 陈晓东,金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节能减排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J].经济纵横,2016,(7).
- [2] 金碚,科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N].人民日报,2016-03-07.
- [3] 陈晓东,郝丹,金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节能减排与我国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6,(9).
- [4] 陈晓东,常少观,金碚.区域节能减排成熟度与经济发展研究——以内蒙古为例[J].区域经济评论,2016,(6).
- [5] 陈晓东,金碚.促进西部资源型省区节能减排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J].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A],2016,(59);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J].2016,(16).
- [6] 陈晓东,金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7] 课题组.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6.
- [8] 孟凡君,节能减排指标分配体系需要改革完善[N].中国工业报,2015-03-12.
- [9] Shahid Yusu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t the Millennium[M]//Joseph E. Stiglitz, Shahid Yusuf.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1-53.
- [10] Joseph E. Stiglitz. 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s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M]//Joseph E. Stiglitz, Shahid Yusuf.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509-526.

责任编辑:晓立